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

孙昌武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

孙昌武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F120/S318

(京)1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孙昌武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ISBN 7-04-005752-2

I. 中… II. 孙… III. 佛教哲学-影响-古典文学-中国-研究 IV. 1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9273 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100009 传真:4014048 电话:4054588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字数 330 000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 175

定价:22.00 元

凡购买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

质量问题者,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内 容 简 介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维摩诘经》中所包含的大乘出世间而不离世间的思想和观音崇拜中所包含的“他力救济”信仰,即在社会中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本书作者穷十年之力,从浩瀚的文史古籍中梳理出大量资料,并据以系统阐述了这两种信仰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维摩诘经》与六朝以后历代文人、居士的关系,观音的俗神化及其与文学艺术的因缘,从而阐明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侧面,也为佛学研究提供了自己的视角。本书可供文史哲及宗教方面的研究者、爱好者阅读参考。

Vimalakīrti and Avalokiteśvara in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Vimalakīrti and Avalokiteśvara are two famous Budhisattva of Mahāyāna. Their extensive propagation have profoundly impacted on Chinese thinking and culture. This book details the expression and manifestation of the beliefs of Vimalakīrti and Avalokiteśvara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process of their complicated transformation. The book also introduces new perspective and provides important material f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t is highly readable, furnished with concrete material, rich in contents, and full of new ideas.

Contents Introduction

Chapter 1 The Search for Salvation

—— the Budhisattva Mentality

Chapter 2 The Propagation of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Chapter 3 The Propagation of the Avalokiteśvara Belief

Chapter 4 Eminent Figures, Celebrated Bhikṣu, and Vimalakīrti

Chapter 5 The Tale of Incarnation of Avalokiteśvar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ix—Dynasty

Chapter 6 The Scholar—Upasaka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Vimalakīrti

Chapter 7 The Literature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 1 •

and the Belief of Sukhavati Avalokiteśvara

Chapter 8 The Literature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the
Belief of Sahasrabhujasahasranetra—Avalokiteśvara

Chapter 9 Vimalakirti in the Vernacular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Chapter 10 The Secularization of Avalokiteśvara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hapter 11 The Official—Upasaka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Vimalakirti

Chapter 12 Avalokiteśvara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fterword The Illusive Salvation and the Lost Belief

Mr Changwu Sun (1937—), currently a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Nankai University in Tianjin, China, was a visiting professor of Yeungnam University in South Korea (1993—94), a research fellow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stic studies (jinbun Kagaku Kenkujyo) of Tokyo University in Japan (1989), and a visiting professor of Kobe University in Japan (1984—86). As an exper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Prof. Sun is the author of *Poetry and C'han*, published by Taiwan's Dadong Chuban Gongsi, 1994, 301pp; of *Buddhism and Chinese Literature*, by Taiwan's Donghua Chubanshe, 1990, 384pp, and Shanghai's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of *An Overview of the Guwen Movement in the Tang Dynasty* by Tianjin's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4, 370pp; and of *Biography of Liu Zongyuan*, Beijing's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2, 458pp; etc.

目 录

导 论	1
第 一 章 寻求救济——菩萨思想	17
第 二 章 《维摩诘经》的弘传	35
第 三 章 观音信仰的弘传	68
第 四 章 六朝名士与维摩诘	94
第 五 章 六朝观音应验传说	132
第 六 章 唐代文人居士与维摩诘	157
第 七 章 净土信仰与净土观音	194
第 八 章 大悲观音信仰与文学艺术	234
第 九 章 唐代俗文学中的维摩诘	261
第 十 章 观音的俗神化与艺术化	286
第十一章 宋代的官僚居士与维摩诘	317
第十二章 宋代以后文学创作中的观世音	361
结 语 救济的虚幻与信仰的失落	388
参考书目	407
后 记	421



研究和认识历史的困难，不只在完备地搜集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解释，更为艰难的是恢复并描述出历史上千百万人生存与斗争的真实、生动的画面。从根本上说，每个时代的历史都是千千万万平凡的个人参与创造的。他们带着自己的愿望、激情、理想、幻想生存过、拼搏过，互相交往、斗争过。正是这亿万人的活动铸成了一代代历史。今天那些名垂青史的人物，不过是他们的代表、他们意志的体现者而已。这样，许多前人所书写的历史，一般就成了鲁迅所谓“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其内容比起民众真实的历史活动来，是太苍白、太贫乏了。事实上，民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比起任何书面记录是远为丰富多采、活泼生动的。然而，今天的历史家却永远不会、或者说不可能去穷尽历史真实的底蕴。正如利用外国的报刊、导游书等各种资料难以全面、细致地了解有关国家的真实情况一样，无论多么丰富的史料也只能让我们感受到它们所记录的时代的脉搏，却不可能全部重现历史的生命。这是摆在历史家面前的永远不能解决的难题，是历史家内心不可克服的悲哀。但却正因此，历史又激发起人们永不衰减的兴趣。这样，再现历史的真实图象，也就成了一代代人不懈地追求却又永远不会完全达到的目标。

对于更为真实、全面地把握历史发展的真实图景，艺术（包括

文学,本书主要讨论的是文学)与宗教研究的意义被人们越来越看重了。艺术与宗教是性质根本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它们同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一个时代的艺术与宗教同样从不同侧面相当直接而真切地反映着人们的精神面貌。而且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艺术只是宗教意识的一个方面。”(《美学》第一卷 12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版)他是从绝对理念的辩证发展的角度来揭示二者的关系的。扬弃其唯心主义的内容,他这样从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与辩证关系来认识艺术与宗教的一致性,是相当深刻的。在现实发展中,艺术与宗教之间不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且常常融而为一。艺术反映着宗教内容——从信仰、教义到感情、习俗;宗教也利用艺术手段——从形象、语言到思维方法、表现方式。而在宗教艺术(文学)中,二者则完全统而为一了。那些宗教艺术作品,往往从独特的侧面把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反映得特别真切、生动、透彻。这就成为我们必须重视宗教艺术和艺术中反映的宗教内涵的根本原因。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佛教对中国艺术(文学)产生过极其巨大的影响。特别是自两晋之际到两宋之交这近千年间,佛教不仅广泛作用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在文学艺术领域,更成为推动其发展、创新的主要动力之一。佛教之输入中国,不仅是传入了一种异民族的宗教信仰,也是传入了面貌全新的外来文化。这种宗教所代表的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一样是世界上具有最为悠久和优秀的传统的文化之一,它是由印度和中亚广大地域的各

族人民经千百年的努力创造出来的^①。而世界文明史的公例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与创新，借鉴外来文化乃是重要的机缘。佛教之输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正是先秦以来历时最为长久、规模最为巨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外文化交往的洪流。中国文化之沾丐于佛教文化是多方面的，其丰富内容本书不拟、也不可能全面地予以讨论。仅就文学范围而论，中土在传统上宗教观念本是相对淡薄的，佛教传入以前还没有定型的宗教，宗教意识在文学上的表现因而也是有限的。但自佛教甫传中土，即使“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受到了相当热烈的欢迎。而在民众间，更得到了普遍的弘传。这一新鲜的外来宗教在文人创作和民间文学中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虽然这影响的形式和程度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其积极或消极的方面如何评价也应具体分析，但总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自东晋时期佛教在文坛盛传，几乎没有哪一位重要作家是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的（反佛也是一种影响的表现，而且一些反佛的人也受到佛说的熏习）。民间文学所受佛教的影响就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从这个意义讲，研究中国文学史，科学地总结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不能不研究宗教，不能不研究佛教（还有道教以及民间宗教）与它的关系。宋明以来，一些理学家（其中不少是阳儒阴释的）不加分析地鄙弃宗教，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隘有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陈垣《明季滇黔佛教

① 一般称印度为佛教的发源地，这是约定俗成的说法。佛陀生于今尼泊尔境内，主要活动在今中印一带。他所创立的佛教在纪元前广泛流传于南亚、中亚，即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兰卡等广大地区。而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佛教首先经由中亚地区，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的、直接的源头。早期到中土传教的僧侣多来自中亚，汉译佛典不少是由中亚“胡语”传翻而来的。这是研究佛教传播史和文化交流史所应注意的。参阅季羡林《浮屠与佛》，《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第1—1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而近几十年来，除了历史传统上遗留的偏见之外，更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大陆整个宗教研究十分薄弱，涉及到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比如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对佛教与文学的关系都少有涉及。讲到的地方，也多是作简单的批判了事。这表现为文学史研究中的重大缺陷，也是整个研究工作进展的重大障碍。

从宗教史的角度说，宗教本是历史上千千万万人的实践活动。教理的形成和阐释，教团的组织与运作，戒律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宗教发展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精神伦理各方面的影响等等，当然都是宗教实践的重要方面。这也是一般的宗教史研究作为主要内容的。但宗教的最具生机的部分，它的最强大的能量，却存在于群众的宗教实践活动之中。推动一种宗教在一个国家的发展的，也主要决定于民众的接受和理解、愿望与要求，只不过表现得或隐或显而已。就中国佛教的情况而论，首先应注意这是“中国佛教”，即是说，它不同于印度佛教。这是外来宗教移植到中国、又由中国人创造出的新的果实，是在中国独特的思想土壤上形成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次还要注意到，中国佛教在发展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层次，各个不同的领域。在统称为“中国佛教文化”的总的范围之内，有高僧大德的精致的佛教教学（在六朝时期叫做“义学”），还有普及到广大民众间的信仰实践；有居于社会上层的文人学士们的高级佛教学术，也有表现民众的真挚而朴素的信仰的宗教活动、文艺与风俗等。中国历史上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佛教教学水平义学沙门与信仰佛教的官僚士大夫们发展了高水平的佛教思想和佛教学术，创造出在宗教思想和学术上都极富价值的中国的佛教学派与宗派，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代表了中国佛教教学水平，也是一般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但还应当认识到，更能真切而又生动地反映民众精神的是他们自身的信仰实践，是表现这种实践的更为朴素的文艺创作

与风俗等等。实际上,历史上佛教发展的主要动力正是这种民众的信仰活动,它的历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是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可以说,民众的这种信仰实践乃是全部宗教文化的基础,是民众精神史的极活跃、生动的部分。这样,中国历史上一代代民众(也包括文人)留下了大量关系佛教内容的文艺作品,其中反映着他们的信仰与感情,寄托着他们的期望与幻想,这是宗教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这种实践的生动资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从一定意义说,比起隋唐时代各宗派高僧大德那些长篇弘论的著述、义疏来,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和彩塑,敦煌写卷中的变文与歌辞,更能反映民众的信仰心理,也更直接地表现了当时佛教的实态。这样,研究、了解中国佛教史,只考查佛教如何传播,有过什么译人,出过什么经论,学派、宗派如何形成、发展等等,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探讨民众的宗教活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这是反映民众宗教生活的极其丰富、生动、可靠的材料。因此,佛教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包括与民众的文学、文艺活动的关系,就应该是佛教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从现实情况看,无论是佛教学界还是文艺学界,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

再就文学本身的特质说,它作为艺术创作,要利用形象,诉诸感情。而宗教的根本在于信仰,它所解决的是精神世界的问题,它必然带有神秘性(或者说是先验主义)和盲目性(或者说是蒙昧主义),从本质上说必然是反理性的。宗教当然需要、实际也存在哲学的、理性的论证(这在佛教还相当的充分),但其最终目的则还是要确立信仰。这就要诉诸人们的内心,特别是他们的情感。这样,文学艺术对于表现宗教意识,对于宗教宣传,就是特别适宜的。而从佛教的发展看,印度佛教本来就有着优秀的文学艺术传统。在中国深厚而卓越的文化环境中,佛教的文学艺术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全部中国佛教文化里,文学艺术是极其重要而又成果丰硕的部分之一。它不但在宗教宣传上起过巨大的作用,

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方面的价值。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中,有相当多的人是从有关佛教的文艺创作(例如民间传说、小说戏曲)之类的材料来认识佛教、形成他们的信仰的。因此,佛教文学艺术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还成为我国文学艺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不容替代的价值。更进一步的情况是,佛教文艺中表现的内容往往是通俗化的、形象化的,经常有意无意之间对教义作了自由的发挥以至“歪曲”。这实际上正表现了作品创造者和流传者当时、当地的佛教理解,从而也就造成了佛教本身的演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是推动中国佛教发展的有力因素。例如本书将要讨论的文学创作中表现的维摩和观音,它们本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但它们同时表现了形成于中土的独特的佛教观念。中国的“观音文学(艺术)”和“维摩文学(艺术)”对于佛教和文学都是不容忽视的部分。

基于以上理由,本书将把在中国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观世音与维摩诘在文学中的表现作为讨论的中心。这是佛教影响于文学的典型表现,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佛教与文学的关系的典型事例。

二

一个民族或国家接受一种外来宗教,必须经受剧烈的思想斗争过程。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而卓越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国家,这个过程就更为艰难和复杂。而在中土接受、消化佛教,把它融入自己的传统中,大乘佛教的两个菩萨观世音与维摩诘起过重大的作用,有着突出的表现。在文学艺术中,这两位菩萨无论是作为信仰对象

还是他们^①所代表的思想观念,都产生过强大而长远的影响。他们在文学艺术中的种种表现,又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中土人士接受佛教的特征。这样,研究文学中表现的观世音与维摩诘,作为中国佛教发展中的个例,无论是对于了解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还是对认识中国佛教,都是十分重要的、有意义的课题。

范晔《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讲到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情况时说:

……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

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这里所谓“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指的是大乘般若之学,而“精灵起灭,因报相寻”则是指小乘禅术之学,汤用彤曾精辟地概括说:

在此时期中(指汉末到晋代中思想史的过渡时期),可以说佛学有两大系统:一为“禅学”,一为“般若”。禅学系根据印度的佛教的“禅法”之理论,附会于中国阴阳五行以及道家“养生”之说。而般若则用印度佛学之“法身”说,参以中国汉代以来对于老子之学说,就是认老子就是“道体”。前者由汉之安世高传到吴之康僧会,后者由汉之支谶传到吴之支谦,当时两说都很流行……。《汉魏佛学的两大系统》,《理学·佛学·玄学》第2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这样,佛教初传,大乘般若学被等同于老、庄,小乘禅术则被视若神仙方术。佛教只能这样依附于中土固有意识而开始在中土传播。尽管后来更为精确的、本来面目的佛教教义逐渐传来并被人所理解,

^① 观音和维摩在本书里是被当做“人物”对待的,因此用人称代词“他”或“他们”。提到信仰则作“它”或“它们”。

但早期的这一所谓“格义”^①的传统在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中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

中土民众和士大夫广泛接受佛教,是在东晋时期。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的,那么到这时已经过了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在这相当长的时期内,佛教在中国就是沿着上述两个方向发展的。不过如上引汤用彤文接着说的:“因为种种的原因,后者(即融合道家的般若一派)在学术上占较大的势力”。这里“学术界”的限制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就信仰层面说,融合神仙道术的一派更长久、深入地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在以下讨论观音信仰时会清楚地看到。

具体到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而言,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很巨大。而在初期,更直接的影响是小乘禅数之学。《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鱼豢《魏略·西戎传》,讲到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从大月氏王使口授《浮屠经》,所授应即是《本起》、《本行》等佛传类经典。公元一世纪,大月氏在中亚建立贵霜王朝,这个王朝在迦腻色迦王统治时期加护佛教,使之得到很大发展,部派佛教的说一切有部在其地十分流行。此部派中有一批“譬喻师”,多传说佛传、本生等譬喻故事。早期的外族的和中土的佛教信徒通过“丝绸之路”往来,首先要利用这类形象、生动的故事来传播教义,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十分适应习惯于神仙方术的中国人的心理。反映在文学上,则如鲁迅先生所说: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神仙志怪之书。(《中国小说史

^① 《高僧传》卷四《法雅传》:“……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事数”谓佛教名相。这是佛教初传时期的翻译、表述、解说佛典的方法,也是当时人理解外来佛教义理的途径与方式。实际上,这种接受佛教的方式直到后来也保持着长远的影响。

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而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层,特别是知识阶层中,附会老、庄的般若学同时流行开来。《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楚王刘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明帝永平八年(65)诏天下有死罪可用绢赎,刘英奉黄绢、白纨五十匹,明帝诏中有“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之语,表明像楚王刘英这样的有文化教养的统治阶层人物是把“黄老”与“浮屠”混同对待的。后来玄学盛行,般若空观被当做辨析本末、有无,追求“至道”的妙理来理解,玄学与佛教从而合流,所谓“格义”佛教进一步得到发展。玄学是自然哲学,般若学是宗教哲学,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但二者在追求精神的超越和人生的解脱上又有共同的企向。这样,般若依附玄学发展,玄学则借助般若充实了内容。

观音信仰是大乘佛教的独特内容,集中体现了早期大乘在发展中形成的“他力救济”观念。观世音菩萨具有捷如影响的救济力量和平易近人的性格,在中土初传即带着他的全部威力与神秘性,征服了具有神仙方术传统的中土大众。《维摩诘经》则是一部集中阐述大乘空观的经典,它表述得简洁而有生动,特别是它宣扬出世间而不离世间的居士思想,更容易被热衷于现世的中国知识阶层所接受。这样,在自东晋开始的佛教在中国广泛流传的过程中,观音信仰和维摩信仰可以说是体现了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潮流、两种倾向的代表,成为十分受欢迎的内容。这也表明,佛教必须适应中土传统才能传播和发展,中土人士则从外来的佛教中汲取所需要的内容,并逐渐将其融入自己的传统中。所以,从总的发展方向看,观音信仰和维摩信仰的弘传,也反应了佛教在中国流传的特点及其规律。

三

如上所述，观音信仰的核心是现世救济，它广泛流传于社会各阶层之中；而维摩信仰的重点是宗教哲学，它主要受到知识阶层的欢迎。二者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明显的不同点，但又有基本的共同之处。而正是这些共同之处使它们同样地得以被热诚接受，并形成中国佛教中，也是普及中土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巨大而延续久远的信仰潮流。

首先，二者都集中宣传佛教的救济、解脱的教义。佛教修证的终极目标是解脱，即超离生死轮回，进入一个不生不灭的永恒境界，这就是所谓“涅槃”。观音信仰和维摩信仰都集中宣扬解脱、救济观念。然而它们各自对于解脱观念又有截然不同的发挥，这种发挥是出于中土人士的意识。观音所体现的是现世救济，拔苦与乐，解脱人们的水火刀兵之灾等等，它适应了人们超离苦难现实的要求。在这一信仰中，它力救济观念被突出地强调。后来观音信仰在中国发展出不同的形态，但这一根本精神始终贯穿其中。而在维摩信仰中，济度则侧重在精神方面。《维摩诘经》宣扬“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希望把现世转变成清净的佛国土，在平凡的人生中得到“觉悟”。并认为有了这种“觉悟”，树立起“睿智”的世界观和洒脱的人生观，就举足下足，皆在道场。由于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决定了它们的接受对象也有一定的差异，未来发展也出现了不同的前景。但从整个思想史的发展看，二者的内容却又正可以相互补充。

其次，观世音和维摩诘这两位菩萨都具有出世间而不离世间的性格。二者所体现的教义都极富人生内容，同样突出发展了大乘